

聂耳传

NIEERZHUAN



● 王懿之 著
● 上海音乐出版社

聂耳传

NIEERZHUAN

王懿之 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5 号

责任编辑：方立平

封面设计：袁银昌

聂耳传

王懿之 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插页 8 字数 289,00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80553-353-9/I·11 定价：5.90元

献给：

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伟大的
人民音乐家聂耳及其为民族解
放而英勇斗争的战友和先烈们！

永生的海燕

(代序)

DB 118 夏衍

中国人民的歌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运动的奠基人聂耳同志，在日本鹤沼海岸逝世已经整整 20 年了^①。他真像暴风雨前的一只海燕，骤然而来，倏然而去，从 1932 年到 1935 年这短短的四、五年中，用他豪迈明快、充满信心的歌声，对亿万受难的中国人民，表达了他对革命暴风雨的预感。高尔基在《海燕》中写道：

“暴风雨！暴风雨快来了！这勇猛的海燕，在闪电中，在怒吼着的海上，得意洋洋地飞翔着，这胜利的预言者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这正是我们这位天才艺术家的最恰当的写照。

聂耳同志是在 1932 年——暴风雨快要到来的前夕，闯进到上海这个斗争最剧烈的漩涡中来的。当时，他还是刚满 20 岁的青年。一到上海，他就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参加了“苏联之友社”，他奋不顾身地工作，为了要求自己能有一个“稳定的、正确的立足点”，他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 1933 年加入了中国共

① 本文是夏衍同志为纪念聂耳同志逝世 20 周年而写的，现用来作本书代序。

产党。

在短短的3年中，他创作了30几首不朽的歌曲。这些作品，全是在参加紧张的革命运动的间隙中创作出来的。在革命的暴风雨中，他真表现了“得意洋洋地飞翔”的姿态。他演话剧，当电影演员，组织业余歌咏团，为革命工作“跑腿”，关紧了门学小提琴，老远地跑到任光同志家里去练习钢琴，……他永远不知道疲倦，不论什么工作都“抢”着去做。他不止一次同我说，“有哪部电影要作曲？我在抢工作”。

“抢工作”，是的，他不仅不推诿工作，他一直是抢着做工作的。记得1934年，田汉同志被捕，留在我手边的是一个电通公司决定了要开拍的、写在几页十行纸上的《风云儿女》的电影故事。我替他改写成电影台本，交给了导演。几天之后遇到聂耳，他第一句话就是：“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我干！交给我。”他重复了一遍，“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这，就是很快地唱遍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了爱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力量的、今天的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①。

聂耳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他欢喜花，欢喜书，欢喜孩子，欢喜运动，欢喜用种种方法来逗朋友们开心。总之，他热爱生活，热爱生活中的一切健康、美好的事物。在他当时处身的那个社会，天真老实是注定了要吃亏的。他上过当，失过恋，不止一次受过他所认为“朋友”的人们的奚落和欺侮，但是，我从来没有在

^① 本文发表于1955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当时《义勇军进行曲》还是代国歌。

他脸上看到过苦闷和忧愁。他可以说是革命乐观主义的化身。他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立刻就会发出欢笑、活跃和一种蓬勃的青春气息。

聂耳的乐观主义精神，发源于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的信心。我看见过他曾为战友的牺牲和被捕而切齿痛恨，但是他懂得，只有加紧工作才是对敌人的最有效的回击。高尔基对海燕的描写完全适用于聂耳，“在它的叫喊中，有的是对暴风雨的渴望，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和对胜利的信心。”

聂耳离开我们已经 20 年，假如他活着，今天才只有 44 岁，他死得太早了。但是，聂耳死了，聂耳的精神，聂耳创作的歌声，已经肯定地永生不朽了。中国人民已经“起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仿佛又听到了聂耳同志的笑声。聂耳同志笑得更爽朗了。

七月十七日

序 言

聂叙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曲者、人民音乐家聂耳，离开我们已经 56 年了。他的祖籍是云南省玉溪县。1912 年 2 月 15 日出生于“四季如春”的昆明市；1935 年 7 月 17 日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岸因游泳不幸溺水遇难！不到 24 岁就完结了他的宝贵生命！胞弟之死，不仅是我们全家的不幸，也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聂耳短促的一生，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是在昆明度过的。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学校生活。我们弟兄形影不离地生活、学习在一起，那时的情景，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虽然至今我们已分离半个多世纪了，仍一直在深深地怀念着他。他的思想言行、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聂耳的童年，家庭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他 4 岁的时候，父亲就因病与世长辞了！家庭经济处于十分贫困的境地！全家的生活重担，完全落在母亲的肩上。她继承了父亲的医药业务，经过官方的考试，被录取为合格的中医。她自己看病、自己配药，惨淡经营着那个“成春堂”小药铺和诊所，夜间还要在油灯下做一些针线活计来弥补家用，勉强维持着一女三子全家 5 口人的生活。

聂耳从小就受到母亲的严格教育。母亲常对人说：“子女就

像树苗一样,不好好培育,就不能成材。”她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她订出了一条条家规要子女们遵守。如:生活要有规律,要早睡早起;要按时读书写字;不准赌博、抽烟、饮酒;要敬老爱少,待人以诚,讲究信誉,不准说谎话。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和拿别人的一针一线等等。这些家规,谁要是触犯了,谁就要受到母亲的严厉斥责。子女们都不敢轻于违反,聂耳更是严遵母训,身体力行。

母亲还以讲述民间故事,作为对子女教育的一种方法,几乎每晚临睡之前,她都要把孩子们叫到身边,围坐在一起,听她讲述民间故事,一般都是以精忠报国,孝顺父母,为官清廉,助人为乐,秉公办事,见义勇为以及因果报应等为题裁的内容。她用优美动听的花灯曲调,边唱边讲,聂耳总是聚精会神地倾听。这些故事,就像种子一样,深深地播种在聂耳幼小的心灵里。使他明辨善恶与是非,爱憎分明。当他听到穷人的悲惨遭遇,好人受到委屈的情节时,就愤愤不平,有时还会流下同情的眼泪,捏着小拳头,要为这些人报仇雪恨!特别是母亲唱出优美动听的曲调,使聂耳从小就受到音乐的熏陶。

为了鼓励子女上进,母亲还经常以“人穷志不穷”、“少年不努力,老大徒悲伤”、“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等民间谚语来激发子女的进取心。聂耳的健康成长和道德品质的培养,是和母亲的精心教育分不开的。

聂耳的学校生活,从6岁时就开始了,尽管当时的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母亲还是不顾操劳,想尽一切办法,把他送进昆明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初小。初小毕业后,继续供他进私立求实小学校念高小。接着在云南十一县属联合中学读初中,直到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外国语(英文)组毕业。为使聂耳受到

系统的学校教育,母亲付出了她的全部心血和精力。聂耳也深知能到学校念书,确是来之不易,因而更加刻苦学习,无论在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各科成绩都是名列前茅,没有辜负母亲对他的期望。

聂耳从小就受到云南地方戏曲和民间音乐艺术的熏陶,喜爱戏剧与音乐。他常常跑进茶馆里欣赏滇戏的清唱,到庙堂里倾听洞经音乐的演奏;逢年过节,又钻进人群中观看云南的地方歌舞剧“花灯”。他对器乐也很感兴趣,他向一位邻居木工师傅学会了吹笛子;在学校老师的帮助下,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吹口琴等;后来,又跟一位法籍英文老师,也是有名的钢琴家柏希文先生学习乐理,掌握到一些音乐的基本知识,并学会了弹钢琴。接着,又开始拉练小提琴,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在学校中,他积极参加话剧的演出,也喜欢搞一些体育活动。总之,他的兴趣是十分广泛的。在愉快的郊游行列中,更是少不了这位天真活泼、喜说好动的青年人。他利用假期几乎跑遍了昆明近郊的各个湖山名胜。他热爱祖国的秀丽山河,热爱祖国的一草一木。

聂耳进入初中以后,正是我国社会动荡不安,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刻。喜爱学习的聂耳,通过阅读《东方杂志》、《环球旬刊》、《创造月刊》、《现代新兴文学诸问题》等进步书刊,以及鲁迅的一些文章,如《呐喊》、《彷徨》等,增加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受到革命思想的启发与教育。当时,大革命时期广泛流行的《国际歌》、《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列强》等充满革命激情的歌曲,更是在聂耳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聂耳后来,正是继续沿着这条革命的道路,创作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歌。

1927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无数革命先烈惨遭屠杀,云南很快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聂耳所在的学校,不断遭到军警的搜查,经常有进步师生被捕。在这严重的关头,在生死的考

验面前,追求真理的聂耳,于1928年秋,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共产党员李国柱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做过散发革命传单等秘密工作,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他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还积极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屠杀云南学生的国民党官僚的革命斗争活动。

1928年冬,聂耳进入省师已3个学期,当时,云南政局动荡,革命与反革命力量悬殊,学生运动受到较大挫折,他为革命事业不能迅速推进而苦闷,认为必须投入到武装力量中去,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时,正好驻扎在湖南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来昆明招收“学生军”,标榜它是革命的军队。聂耳瞒着家里,考进了这个军队,随着带队的人,经越南、广州到达湖南郴州。他发现:这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革命军队,实际上是以招收“学生军”为名而补充新兵。但已无法摆脱。他亲身经历了新兵生活,更看清了旧军队的腐朽本质。在几位云南低级军官的帮助下,才脱离新兵营,转到连部充当一名文书上士。后来部队缩编遣散,聂耳利用这个机会,领得遣散费,于1925年5月,又回到昆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原班继续学习。半年的军队生活,使聂耳经受了一次严酷的实际锻炼。

经过这次挫折,并没有使聂耳的革命意志消沉下来,他对学习更加努力,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并以文艺为武器,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经常参加演出。当时,募捐救灾,兴办学校捐款,以及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一般都是采取音乐会和戏剧演出的形式进行。聂耳总是踊跃参加。

1929年7月11日,由于云南军阀内哄,搬运军火炸药备战,引起了昆明市北门街江南会馆火药库的大爆炸!无辜的老百姓死伤数千人,灾情十分严重!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在“济难会”的掩护下,组织救济灾民,进行革命斗争。聂耳作为“济难

会”的主要成员,参加了学生组织“七·一一青年救济团”,他以高度的革命热情,积极参加了救灾工作,竭力救济灾民和被关押在监牢里的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组织灾民向反动政府请愿,要求惩办祸首,赔偿损失。反动政府对“七·一一青年救济团”的活动非常仇恨!施加种种压力,救济团被迫解散。聂耳在学生运动中,参加过反对唐继尧拍卖省师校产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枪杀进步学生梁彦斌的斗争,那时他是以戏剧和音乐作为掩护的,还未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自七·一一火药库大爆炸事件发生后,由于叛徒的出卖,国民党反动派对聂耳的活动,已加紧暗中监视,要向他下毒手了!

一天,我的一位好友李同文跑来告诉我,在他父亲的办公桌上,偷看到一份逮捕名单,上面有聂守信(即聂耳)的名字。要我迅速让聂耳离开昆明。李同文的父亲是当时昆明地方法院的院长,参与了密谋逮捕的工作。这个消息是可靠的。但离开昆明到哪里去呢?旅费也不容易筹集,就是离开了,今后的生活又怎么办呢?这时,聂耳刚由省师毕业,玉溪教育局曾聘请他到玉溪中学教英文。如果到玉溪去,还是在反动政府的魔爪之下,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只有去省外逃避,比较安全。这时,正巧一位福建朋友薛耕愚先生,在上海设立“云丰申庄”,经营纸烟业务,约我去担任会计,我想,如果聂耳能担任这个工作,就可以很快离开昆明了。旅费全由店方负担,到了上海也有个落脚的地方,生活上也有保障,我不能让自己的弟弟被反动派抓走。我立即同薛耕愚商量,托辞我因照顾老母,不能离开昆明,让聂耳顶替我去。他接受了我的意见。这样,聂耳就在1930年7月10日离开了昆明,闯进了纸醉金迷的上海滩。开始了他的店员生活。这时他才19岁。

聂耳来到上海,每天和算盘帐簿打交道,有时还要拉板车运

货,他对这些工作根本不感兴趣,看到店里的同事,成天打麻将,也非常厌恶。感到这里不是他久居之地。他利用业余时间,自觉地攻读革命文艺理论,刻苦自修英语和日语,阅读各种进步书刊,苦练小提琴,等待时机,另找出路。聂耳到上海仅仅两个月,就参加了党领导下的“上海反帝大同盟”虹口区的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游行示威的活动。

1931年3月,“云丰申庄”因亏本倒闭,聂耳失业了。为了生活,他到处奔波,寻找工作。正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看到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社”,招聘小提琴师的广告,就去应考。经过严格的考试,从报考的100多人中录取3人,他被录取了。解决了吃住两大问题,并且有了一个可以安心学习音乐的环境。从此,他更加勤奋地苦练小提琴,每天练习经常达6小时以上。并开始学习和研究乐理,进步很快。为了进一步提高小提琴的技术水平,他向一位外籍音乐家学习,虽然学费很贵,要付出他工资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有时还要典当衣物来交学费。尽管生活这么困难,他仍坚持下去,从未中断。

聂耳在刻苦钻研音乐的同时,仍然注视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1932年4月,聂耳通过著名戏剧家田汉,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参加了由任光、张曙、吕骥等革命音乐家组成的“苏联之友社”的音乐小组。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聂耳广泛地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并经常为报刊杂志写电影音乐评论文章。

1932年起,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疯狂的军事侵略。“九·一八”、“一·二八”事件接连爆发,民族危机十分严重。但是,“明月歌舞社”的领导人,为了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单纯追求票房价值,在国家民族危亡的重要时刻,仍在上演《桃花江》、《毛毛雨》一类靡靡颓废的节目。聂耳对此是深恶痛绝的。他劝告黎锦晖要改变作曲的方向,但没有被接受。聂耳认为:必须把这

样的问题,在社会舆论面前揭示出来。他用“黑天使”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中国歌舞短论》的论文。一方面肯定了黎锦晖的作品中有反封建的因素,同时他批评了黄色艺术颓废的影响,他严厉地指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还说:“资本家住在高楼大厦大享其福,工人们汗水淋漓地在机器下暗哭!”“你不听见在这地球上,有着无穷的一群人在你的周围呐喊!狂呼!”希望他“向群众深入……创造出新的艺术”。聂耳还在日记中总结说:“我实在不该和这些没有希望的人鬼混,我要做的事还多着呢。我是一个革命者!”聂耳以“反叛者”的姿态离开了“明月歌舞社”。

1932年8月,聂耳来到北平,他利用一切时间积极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各种活动,写文章、演话剧。在北平文艺界联合大公演中,他在反动军警与革命群众进行搏斗的集会上,拉奏《国际歌》,表示对反动派的抗议。直到他离开北平的前夜,他还参加了话剧《血衣》的演出。他走到天桥贫民区倾听劳苦人民发自内心的呼声。同时继续顽强地坚持练习小提琴。终因生活没有保障,不得不重返上海,另找工作。

1932年11月8日,聂耳从北平回到上海。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文艺的“文化围剿”,他投身到党领导下的电影战线,先后在联华影片公司第一厂、百代公司音乐部和联华第二厂工作。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1933年初,聂耳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聂耳更加勤奋地创作革命时代的音乐,真正反映了劳苦大众的呼声。从1933年到1935年,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创作了《大路歌》、《开路先锋》、《新女性歌》、《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梅娘曲》、《卖报歌》、《义勇军进行曲》等30多首歌曲。这些歌曲,都是通过电影、戏剧的演出,立即在

大江南北广泛流传。打破了当时音乐界的消极与沉寂，振奋了人们的精神，鼓舞了斗争中的人民。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当时已成为动员中国人民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最响亮的号角。

由于聂耳充满战斗激情的歌曲，蓬勃高涨的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惧，反动当局不许演唱和播放聂耳的革命歌曲，把聂耳的名字列入准备逮捕的“黑名单”中。党组织出于对聂耳的关怀和爱护，批准他迅速离开上海，出国深造，先到日本，然后去西欧、苏联学习。

1935年4月16日聂耳由上海搭轮船到日本，终日忙于参观、学习，除了参加中国留学生的一些文化活动外，还和日本的一些进步人士接触，看过许多进步的话剧和听过许多音乐会的演出，还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

这时，日本的一个进步剧团《新协剧团》，将在7月下旬到京都、大阪等地上演，邀请聂耳参加演出，因距演出时间还有十几天，聂耳想利用这个时间，到附近的名胜地区作短期的游览，就和《新协剧团》的灯光师（朝鲜人）李相南结伴旅行，到了藤泽市的鹄沼海岸，住在日本友人滨田实弘的家里。每天，他们都到鹄沼海岸游泳。1935年7月17日这天，他和李相南等友人同去游泳，不幸溺水逝世。

1936年5月，我到上海迎接由日本运回来的弟弟的骨灰，安葬在昆明市西山森林公园碧鸡山旁边。1980年1月13日又把骨灰搬迁到西山龙门下市人民政府为聂耳新建的墓地入葬。

聂耳的一生是短促的。他出身贫苦，既没有良好的音乐环境，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勤奋刻苦，自学自练，在艰苦的音乐创作实践中摸索探求，他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音乐家。他所创作的音乐作品虽然不算多，

但他能够在自己的歌曲创作中,积极地吸取民族的民间的音调,成功地塑造出民众的音乐形象,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社会现实。在他的歌曲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回荡着历史的轰响,洋溢着劳苦大众的心声,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愿望和性格,从而使他的歌曲至今仍在人们当中广泛地流传,并鼓舞人们的斗志。

王懿之同志出于对聂耳的怀念,编写了这部《聂耳传》,比较全面地叙述了聂耳的生平事迹。在撰写过程中,曾不辞辛劳地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访问聂耳生前的友好,进一步了解情况,力求做到史料的真实和完整。本书是研究聂耳的一部宝贵资料。对此我是感到欣慰的。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但愿我们的音乐艺术,在培养一代新人的伟大任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更多、更美的精神食粮,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

1991.6.8

前 言

在伟大的人民音乐家、我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奠基人聂耳诞辰 80 周年之际,《聂耳传》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诚感欣慰。

《聂耳传》的写作和出版,是我多年的宿愿。《聂耳传》素材的搜集和前前后后的调查研究工作,经历了 10 余年的时间,可谓长矣!

我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名中年史学专业工作者,对音乐艺术是个门外汉,对中国音乐史也知之甚少。那为什么要写《聂耳传》呢?有朋友善意地问我。

这还得从 40 年前的一件小事谈起。1949 年秋天,当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徐徐升起的时候,我这个刚满 6 岁的孩童也跨入了墨江城镇的小学校门。那时,我们的家乡也刚解放,革命热情异常高涨。每天清晨,全校师生都非常严肃地在学校操场上集合整队,唱国歌,升国旗。对国歌、国旗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后来上音乐课时,听老师介绍,《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叫聂耳,是我们云南人,为了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很年轻时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此,我便有意寻找聂耳的资料看。六十年代初读大学时上演的《聂耳》电影,我一口气就看了 3 遍。聂耳为追求真理、为民族的解放而呐喊、为革命事业英勇战斗的精神在激励着我!鼓舞着我!这种精神是最可宝贵的!不但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需要,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